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光谷地标建筑之一的武汉新能源研究院大楼(又被称作“马蹄莲”大楼的仿生建筑)。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供图

## 武汉 地图外两厘米 走向 世界光谷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宇

中国光谷，正走向世界舞台。

上世纪70年代，这里尚是一片荒野之地，因距主城区较远，一度被称为武汉建成区“地图外两厘米”。1976年，青年教师赵梓森在这里拉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数十年间，中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第一个光通信国际标准、第一款商用存储芯片、第一个400G硅光模块、全球首款128层三维闪存芯片、全球首个超高通量“火眼”实验室相继诞生于此。

眼下，这里拥有13家工研院、68家孵化器、108家众创空间；在企博士超过1万人、硕士6万余人、本科学历近30万人，海外留学归国者破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64.5%，在全国10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中位列第一。

### 一根光纤牵起追光路

在武汉市南望山脚下的武汉邮科院家属区，绿树红花掩映着一幢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层小楼，年近耄耋之年的“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就住在这里。

光纤通信，曾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价为“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通信网络。

1970年，美国花费3000万美元制造出了3条30米长的光纤样品，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出对光纤通信有实用价值的光纤。

1973年，赵梓森在武汉邮科院提出发展光纤通信。时值“文化大革命”，中国与世界隔绝，光纤在当时很多专家看来是“天方夜谭”。

一无资金，二无资料和设备，三无实验室，赵梓森多方游说，把单位办公楼一楼清洗间改造成一间实验室，找来年轻同事帮忙，自制设备“土法上马”，一年多里重复数千次试验，造出一台光纤拉丝机。

1976年3月，赵梓森团队拉出一根7米长的玻璃细丝，这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根实用光纤，大大缩短了我国在光通信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1982年，赵梓森在武汉实现了中国的首次光纤通话。中国信息产业革命的大幕，由此揭开。

接下来的30多年里，在这片土地上，以余少华、庄丹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追光

者”，把赵梓森拉出的这根光纤，做成了湖北最具竞争力的通信光纤产业。烽火科技、长飞光纤，成为武汉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湖北光纤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

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一根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我国的光纤通信用品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已是世界第一。

因光而兴，于1988年经由武汉市政府批准挂牌成立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摘取“光谷”之名，是在10多年后。

2000年5月，赵梓森等26位院士和专家，在《关于加快技术创新，发展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议》上签名，吁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建设国家级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次年2月28日，科技部批准了这一建议。

武汉“中国光谷”由此而来。

**光谷在 光 更在 谷**

如果说赵梓森团队拉出的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光纤，照亮了光谷的萌生之路，那么，锁定高新技术项目，自主创新、干事创业的精神气质，从一开始便融入进了光谷的成长基因之中。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武汉，虽然高校、科研院所集聚，但“新技术难走出实验室，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一度制约城市发展。

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之前，1984年，武汉市批准成立“东湖技术密集

经济小区规划办公室，尝试走“项目起步”的新路。这也正是“光谷”的前身。

东湖小区办第一批选出的高新技术项目有两个：武汉邮科院的光纤、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的激光。随后，靠着以政府名义担保向银行贷款、争取外汇等方式，这两个项目被扶持起来。

1987年6月，东湖小区办又首创螃蟹，创立了中国首家高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武汉市一批科技人员带着技术辞职“下海”；为期3天的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器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后来弥漫全国的孵化器热潮，即从这里涌动而出。

初期在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孵化的企业，一共5家。骑着自行车来，开着轿车离开，凡谷电子、楚天激光、武汉三特索道等企业从这里起步，后来逐渐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或上市公司。

1994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条例》出台，鼓励国内外企业、教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在高新区投资或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从事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和咨询等活动。这一条例，在当时全国高新区中是第一个。

东湖高新区原有的行政区域面积有限，如何突破？

武汉市为此专门出台了“托管”方案，将与之相邻的江夏区、洪山区一些村镇，分批次移交高新区管理。这在当时也属全国首创。

从1999年到2010年，历经6次托管，东湖高新区面积达到518平方公里。

光谷在“光”更在“谷”。一代代光谷人坚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形成一批开创性、引领性、制度性成果：出台“黄金十条”，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四级跳”模式，实施“阳光新政”“三办改革”，实行“大部制”和全员聘用制，探索适合创新发展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在这里，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如源头活水，涵养光谷一路茁壮成长。

在许多老武汉人的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武汉最大的支柱产业。时至2017年，光谷光电子产业规模已达4420亿元，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第一，一束光照亮一座城。

30多年里，几代科技创业者薪火接力，将“光之谷”建成“天下谷”的科技新城。如今，光谷拥有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最大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和最大的激光设备生产基地。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下一

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列入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数量与上海并列第一。

**光谷磁力**

1990年出生的郭子逸是武汉人，2015年从华中科大能源学院硕士毕业后，原本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2017年，他回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联合几名师兄设立创投基金，专注手游、动漫等文化产业投资，看准光谷，这里各项政策扶持力度大，人才聚集，项目优质。几年下来，郭子逸团队发展至65人，平均年龄27岁。

2020年6月，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硕士毕业的武汉人郭坚，辞去在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算法工程师的工作，入职位于光谷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希望尽快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利审查员，推动更多原始创新、自主可控技术创新发生在光谷、武汉。郭坚说。

据“才聚光谷”国际云选会平台统计，2020年，像郭坚这样的留学生或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大学生入职光谷的，有400余名。

东湖高新区招才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0年，光谷新增留汉大学生9.52万人。

而在约10年前，武汉这座拥有百万在校大学生的城市，还经历着“留人之痛”：大学生毕业后，往往首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如今，伴随光谷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光谷干事创业。

吸引青年人才，离不开不断攀升的经济实力：2019年，东湖高新区经济总量在武汉市各行政区（功能区）排名第一；2020年，面对封控时间、重启时间晚、疫情影响大等困难，光谷疫后迅速复苏，出台系列扶持企业优惠政策，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深V”反转，全年GDP逆势增长5.1%，率先迈上2000亿元台阶，继续领跑全市，成为省市疫后重振的一面旗帜。

创新是东湖高新区的基因密码，是东湖高新区30多年建设发展的制胜法宝。来自2021年东湖高新区党工委扩大会议上的消息，今年，光谷力争研发投入强度超过10%，发明专利总数突破2.1万件。

在光谷人的规划蓝图中，到2035年，进入全球高科技园区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光谷”。

## 滨海新区的根和魂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滨海新区的做法，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

### 改革 刀刃向内

从渤海湾一片盐碱荒滩拔地而起的天津滨海新区，始终保持着当初拓荒创业时的决心和气度。

2021年2月，滨海新区启动新一轮面向全国公开选聘管委会副主任，这是该区全面推行法定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这场改体制、动饭碗的深层次改革把“刀口”瞄准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取消“铁交椅”“铁工资”，以业绩为导向，以结果论英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都是为了让这片土地在新时期焕发出新活力、新动力。

滨海新区因改革开放而生，伴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放、创新本来就是滨海新区的“根和魂”，也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改革进行时的“直播镜头”。

改革活水曾从这里流过。1984年，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年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里提笔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

### 109枚被淘汰的公章

滨海新区由原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区和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等12个功能区合并而成，多年来率先尝试了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式的改革。

2006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滨海新区要肩负起带动区域发展新增长极的国家使命。这里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北方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伴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滨海新区一直在探索新的历史方位，为全国改革试政策、探新路、谋突破。

一枚印章管审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箱来自天津的109枚被淘汰的公章，那是政府简政放权的生动见证。2014年5月20日，滨海新区组建了全国首家行政审批局，率先实现了单一窗口可办理任何审批。随后，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红色公章逐渐被革了“命”。各地纷纷效仿

天津开发区一直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快速成长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也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曾经这里出品的一支机（摩托罗拉手机）和一碗面（康师傅方便面）闻名全国。然而，这艘高速行驶了几十年的巨轮，渐渐驶入了“静水流深”的航段，吃水加深，问题涌现。

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阵痛期”一样，这个老牌开发区虽然新投产、新达产的大项目不少，但一些大企业增长速度放缓，有的还出现较大下滑，在与各先进区域的激烈博弈中，适应得不快，换挡不及时，曾经最让这里引以为傲的创新发展能力表现不再突出。

与此同时，滨海新区五大开发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现：相互之间缺乏战略协同，发展趋于同质化，产业出现相互“克隆”“撞车”现象，导致发展分散化，形不成合力，攥不紧“拳头”。

2019年，滨海新区再次拿出创业时敢打敢拼的闯劲儿，大刀阔斧推行法定机构改革。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力图在破与立之间，找到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和新引擎。

开发区本身就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时任天津开发区负责人说，我们再一次改革、重组、再造，正是又一次改革开放再出发。

强化经济职能，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高质量发展上，成为这轮体制改革紧紧牵住的“牛鼻子”。滨海新区区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改革前，各开发区管委会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编制身份主要包含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大类。

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人才活力，开发区抓住“处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打破“干部终身制”“论资排辈”的干部任用模式，彻底摒弃“在有为才有位的竞争机制下，选人用人从‘该用谁’变成‘能用谁’”。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说，今后干部不再是“能上不能下”，而是“3年为1个聘期，如果不担当不作为，可能连3年都难坐稳”。

（下转6版）

## 青藏铁路 载着西藏人民奔向共同富裕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工务机械段清筛第二车间在青藏铁路格拉萨站海拔4900米的布强格至唐古拉北区间进行大机线路清筛施工作业。王小清/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周伟

究所、设计院和大专院校的1700多名科技人员，齐聚青海，奔向高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科研攻关大合作。与此同时，铁道兵6万大军再上高原，把铁路向西推进了800多公里，一直修到了昆仑山脚下的格尔木南山口。

历史的步伐不会停滞，西藏的发展不可逆转。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党的第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任西南组讨论上发言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以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上，修建青藏铁路的准备工作在一年已经开始，铁一院集结近700名工程技术人员，对格尔木到拉萨的1000多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初测，并在当年年底与中科院共同组建了冻土科研队，向彻底解决多年高原冻土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冲击。2001年2月8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审议了青藏铁路建设方案。同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仪式在拉萨和格尔木同时举行。

这是一条穿越550多公里低纬度、高海拔、多年冻土地带，翻越5000多米唐古拉山口，征服一系列艰难险峻的天路，但再大的困难也阻止不了中国铁路建设者积聚了近半个世纪的激情。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全长1142公里，从格尔木南山口，直攀昆仑山，穿越可可西里，过风火山，翻唐古拉山，进入西藏，直抵拉萨。其中960公里在海拔4000米以上，不但是全球最高的铁路，更是“生命禁区”。

（下转6版）

### 遭遇 两上两下

2001年6月29日，当青藏铁路开工时，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就已经开始酝酿进藏铁路的建设问题。

可惜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青藏铁路在上个世纪遭遇了“两上两下”。1959年—1961年，铁道兵第一次踏上高原，揭开青藏铁路建设序幕，在海拔5000多米的风火山建成了最早的冻土试验工程，在格尔木以东几百里的荒原上摆开了战场。1974年—1978年，来自中央9个部门与19个省（区、市）的68家工厂、部队、研